

# 银行系统一九八六年外事活动

## 一九八六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外事工作

1986年是我国对外金融关系蓬勃发展的一年。这一年中，中国人民银行的外事工作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回顾一年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

### 一、扩大了同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

1986年，我国同各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一)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更加深入。4月、10月，我国代表团分别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二十四国集团会议和第四十一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联合年会。

按照“七五”计划的要求，我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用了数额为5.97亿特别提款权（合7.12亿美元）的第一档信用贷款。1986年我国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合作也有了新的发展。11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及中外专家们，就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和友好坦率的讨论。外国专家们介绍了现代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经验，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中国人民银行于6月、9月先后两次接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磋商代表团。另外，中国人民银行还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我国举办讲习班，为我国培训财政统计人员和外债管理人员。这些活动加深了我国各

有关部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相互了解，配合了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正朝着更加广泛、深入的方向发展。

(二) 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3月10日，我国正式加入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这是我国发展对外金融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进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1月7日，亚行董事会通过了接纳我国入行的决议草案，送交理事会投票表决。2月17日理事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决议。随后，我即开始办理入行具体手续，并于3月4日向“亚行”缴纳了我国第一笔认缴股本，其中缴纳外汇1712万美元，人民币7100万元。3月10日，“亚行”宣布我国成为正式成员国。

4月30日—5月10日，陈慕华行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马拉拉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第十九届年会。从此，揭开了我国同“亚行”合作的新篇章。

5月12日，“亚行”行长藤冈真佐夫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以后“亚行”又于10月底派专家工作组访华。我国各有关部门分别就贷款和技术援助、统计规则及资料交换等问题与“亚行”广泛交换了意见。可以预料，今后我国同亚洲开发银行之间的合作将会不断向前发展。

(三) 与非洲开发银行的合作有了发展。1986年我国继续向非洲开发银行和非

洲开发基金缴纳股本和认捐款 1113 万美元。5 月,以中国人民银行理事尚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非洲开发银行在津巴布韦举行的第二十二届年会。7 月,非洲开发银行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我国派代表列席董事会。我国驻非洲开发银行代表已于 12 月赴任。

(四)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往来进一步密切。中国人民银行自 1985 年正式与国际清算银行建立业务关系以来,两行之间的业务规模和种类都有了发展。国际清算银行是“中央银行的银行”,是我们了解各国中央银行政策的窗口。继 1985 年第五十五届年会以后,1986 年 6 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派代表出席了该行第五十六届年会。会议期间,我国代表与各国中央银行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往。这对我国了解国际金融形势和各国经济政策都有很大帮助,同时也有助于各国中央银行了解我国的经济形势与政策,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1986 年世界主要货币的利率较 1985 年有所下降,而汇率波动幅度却大于 1985 年。我们通过及时地变换存款币种,调整币种在存款中的比例,调整存期,基本上抓住了国际汇率变动的有利时机,比较而言,避免了相当一部分外汇风险的损失,使我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存款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另外,我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应邀出席了 5 月在加拉加斯举行的加勒比开发银行第十六届年会。1986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向“东南亚新澳中央银行组织”提出加入该组织的合作范围。

(五)11 月 10 日至 13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联合召开了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对于增进双方对方金融市场的作用和职能的了解,和促进中美金融合作,都是有益的。双方达成了关于教育与交流的协议。

## 二、密切了与各国中央银行的往来

随着我国对外金融关系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与外国中央银行之间业务与友好往来日益增多。4 月,邱晴副行长访问了爱尔兰和英国。5 月,童贻银副行长率领中国人民银行业务考察团访问了日本。10 月,刘鸿儒副行长率代表团对摩洛哥王国进行了友好访问。11 月,邱晴副行长率代表团访问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外国中央银行代表团有:新西兰储备银行代表团、联邦德国联邦银行代表团、泰国中央银行代表团、日本的日本银行代表团、匈牙利国家银行代表团、伊拉克中央银行代表团和新加坡中央银行考察团。

这些互访活动体现了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政策,增进了我国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了双方经济与金融关系的发展。

## 三、加强了对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的管理

1986 年,中国人民银行共批准 8 家外资金金融机构在深圳、厦门设立分行和财务公司,其中:深圳 4 个分行(巴黎国民银行、东京银行、三和银行和北海道拓殖银行),一个财务公司(中国国际财务有限公司<深圳>);厦门 3 个分行(汇丰银行、建东银行和标准麦加利银行)。1986 年还批准了 22 家外资金金融机构分别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和南通市设立代表处、办事处和联络处。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还加强了对外资金金融机构在华机构的管理。1986 年,中国人民银行走访了部分机构,对他们在华开展业务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如何帮助这些机构更好地开展业务,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建议。另外,中国人民银行还组织了一些外资金金融机构的官员在国内进行业务考察。这些措施,深受外资金金融机构的拥护。

## 四、提高了外事接待的工作水平和交际能力

1986年是接待外国中央银行、国际金融组织大型代表团最多、工作量最大的一年。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与世界各国金融界的联系、接触与互访越来越多。截止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共接待安排了应邀来访的外国中央银行及金融机构代表团、组28批,201人,这是中国人民银行有史以来邀请来访人数、次数最多的一年。此外,我们还邀请了其他来访的代表团、组422批,1692人次。其中以日本、美国为最多;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的来访人数,也大大多于往年。

截止1986年底,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共有119批410人出国访问、考察,参加国际会议,到国外研修和接受培训。

#### 五、加强了国际金融调研

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肩负着为国家制订和执行各项对外金融政策,代表国家参加国际金融活动的重任。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做到能够正确地分析世界经济形势,能够及时地制订有关的政策措施,从而保证我国对外金融工作的顺利发展。但

是,由于过去长期的闭关自守,中国人民银行的国际金融调研工作一直比较薄弱。为了加强国际金融调研工作,行领导决定,外事局的主要工作是搞好国际金融调研,并于年初在外事局成立了国际金融研究室。为了更好地组织国际金融调研工作,中国人民银行还成立了由外事局、外汇管理局、金融研究所和研究生部参加的国际金融研究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特邀顾问高明任组长。这些措施,使中国人民银行的国际金融调研工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结合我国对外金融关系及实际业务,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对实际工作起了指导、推动作用。如对黄金有息存储业务的研究;对国际贸易证的研究等。1986年还在《经济日报》上开办了“国际金融与我国对外金融关系”专栏,全年共出14期,发表了8万多字的国际金融调研文章。此外,还在其他报刊发表了近180万字的国际金融消息、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为中央和各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信息和政策建议,标志着中国人民银行国际金融研究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李培钦)

## 中国工商银行加强与外国 金融机构的往来和业务合作关系

1986年中国工商银行的对外交往和业务合作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4月,刘廷焕副行长率代表团,出席了在摩洛哥拉巴特举行的国际储蓄银行协会第二十五届年会,并访问了西班牙马德里储蓄银行;7月,黄玉峻副行长率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和英

国,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业务进行了考察,并与德意志银行、西德意志州立银行,以及英国巴克莱银行,签订了代理行协议;

9月,张肖行长率代表团应邀访问了瑞典和芬兰,重点考察了两国的银行体制、储蓄业



1986年9月,工商银行行长张百生代表团访问瑞典。图为张百生行长与瑞典王国议长兼储蓄中央银行董事长本特松先生合影  
(中国工商银行供稿)

务以及电子计算机在银行业务中的应用。在访问瑞典期间,瑞典王国议长兼储蓄中央银行董事长本特松先生接见并设宴款待了代表

团全体成员。一年来,工商银行还派出了六批部室主任级代表团,先后赴日本、意大利、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卢森堡、比利时等国考察银行业务,并与若干家外国银行签订了代理行协议和业务合作协议。同时还派出了100多人次到国外学习银行管理、外汇业务以及电脑使用。

1986年,应工商银行的邀请,有四个外国银行高级代表团访问了工商银行。双方就业务合作进行了友好磋商。工商银行还邀请了意大利商业银行和日本住友信托银行专家,为工商银行在深圳举办了外汇业务培训班。一年来,工商银行还接待了临时来访的外国银行代表团,外国银行机构驻京代表处代表,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外国记者、专家、学者共388批,计992人次,广泛地与200多家外国金融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1986年工商银行外事活动频繁,与国外同业增进了了解、加强了友谊,为今后进一步发 展国际业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工商银行外事部)

## 一九八六年中国农业银行的外事活动

### 一、1986年中国农业银行参加国际金融问题研讨会的情况

4月1日至5日,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区域办事处提议并组织,由中国农业银行担任东道主,在天津召开了“亚洲地区农作物保险问题讨论会”。来自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南朝鲜等国和地区的银行、保险公司的代表以及亚太农贷协会的代表共15人,参加了会议。中国农业银行张文琪副行长和天津、江苏分行的

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5月26日至30日,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和亚太农贷协会组织,由中国农业银行担任东道主,在南京举行了“对低收入经济组合加强银行信贷服务问题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讨论会”。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南朝鲜、哥伦比亚、瑞典的农业银行、发展银行、合作银行、储蓄银行的代表,以及西德发展基金

会、美国农业信贷发展国际、农发基金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区域办事处、非洲农贷协会代表共41名，参加了会议。中国农业银行赵秋喜副董事长及江苏、天津分行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9月22日至29日，中国农业银行与联邦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在北京、重庆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中德合作社运动问题研讨会”。来自联邦德国赖夫埃森联合会及中央合作银行的8名专家及中国农业银行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做了关于中、德两国合作运动问题的报告。中国农业银行王景师副行长、农牧渔业部杨重阳副部长以及联邦德国驻华使馆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会议。

10月23日至28日，由亚太农贷协会、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农业银行共同举办的“农村贫困地区的金融改革国际研究会”，在北京召开。来自泰国、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伊朗、南朝鲜、尼泊尔、西萨摩亚、印度尼西亚以及亚太农贷协会、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的代表共28人，参加了会议。中国农业银行张文琪副行长主持开幕式和闭幕式。

## 二、1986年中国农业银行的 出国访问情况

5月4日，农业银行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国际农业信贷联合会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邀请中国农业银行加入该联合会。

6月26日至27日，联合国粮农组织银行家计划执委会，一致同意接纳中国农业银行为会员。中国农业银行派代表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年会。会议期间，讨论了向中国农业银行提供皮革加工项目技术咨询意见。

8月7日至16日，农业银行马永伟行长一行6人应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的邀请，赴加考察访问。访问期间，农业银行与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签订了业务合作协

议书，重点了解了加拿大农业及农场管理、农业信贷政策以及该行的组织机构、职员培训、计算机应用等情况，加拿大联邦国务部长查理斯·梅耶尔先生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10月22日至11月2日，中国农业银行王景师副行长率领东北三省分行联合会代表团一行9人应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邀请访问了法国。访法期间，东北三省分行联合会与法国北部的比卡迪地区农业信贷银行协会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考察了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体制和业务经营情况。法国参议院议长保埃·阿森先生会见了代表团。

12月8日至11日，农业银行派代表出席了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召开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农业信贷协会第六届大会。大会讨论了“进行金融改革，资助农村贫穷农民”问题。讨论和通过了1985—1986年协会的工作总结，讨论和制订了1987—1988年的工作规划。中国农业银行马永伟行长再次被选为执委会委员。

## 三、1986年国外金融机构 来访情况

2月27日至3月14日，缅甸农业银行五人代表团来华访问，考察中国农业银行体制和农贷业务。

3月20日至29日，意大利农业银行董事长奥莱塔先生率领代表团一行17人，应中国农业银行的邀请来华访问。3月21日，马永伟行长和奥莱塔董事长签署了两行业务合作意向书。戴相龙副行长同代表团的代表们举行了会谈。

4月10日至19日，荷兰拉博银行董事长拉丁努瓦先生一行6人应中国农业银行的邀请来华访问。马永伟行长会见了代表团成员。王景师副行长与代表团成员举行了业务会谈，双方就经济合作项目进行了讨论。

6月19日至29日，意大利国民劳动银

行副行长德尔·蒙提先生一行13人，应中国农业银行邀请来华访问。马永伟行长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成员。戴相龙副行长主持了与代表团成员的会谈。在京期间，代表团成员分别与北京、河南、山东等分行的代表洽谈农副产品加工合作项目。代表团还赴新疆考察并洽谈了合作项目。

7月26日至8月8日，津巴布韦农业信贷公司总经理塔卡·穆通纳先生一行3人应中国农业银行邀请来华访问。王景师副行长会见津巴布韦客人。代表团在京和承德期间考察了中国农业银行信贷政策、信贷管理及贷款回收等有关情况。

9月18日至29日，世界银行第三次农村信贷项目监测组来华，在广西、湖北、湖南、福建四省、自治区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监测检查。

10月7日至21日，泰国农业与农业合作银行托东行长一行9人，应农业银行的邀请来华访问。马永伟行长会见了代表团。张文琪副行长和泰国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代表团先后在北京、天津、桂林等地对中国农业银行基层机构和信用社进行了访问，参观了一批农场、乡镇企业和农户。

11月9日至15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投资中心“银行家计划”5人代表团访问中国农业银行。代表团向甘肃、内蒙、天津、河北等中国农业银行分行以及天津管理干部学院的同志介绍了投资中心的任务和活动，并对有关农业和农产品加工项目

进行了研究。

11月25日，农业银行马永伟行长与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行长酒井守先生，在北京签订了两行业务合作协议书。

#### 四、中国农业银行

##### 利用外资情况

中国农业银行同国际金融组织，截止1986年底，共签订了4个农村信贷项目协定，引进国际优惠信贷资金16800万美元，其中：同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签订了3个农村信贷项目协定，引进资金14300万美元，交由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安徽、福建、湖南4个省、自治区分行负责使用管理；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签订了一个农村信贷项目协定，引进资金2500万美元，交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负责使用管理。按照协定的规定，中国农业银行使用国外资金期限为20年，包括宽限期5年，向国际金融组织提取资金期为4年，农业银行发放人民币配套资金贷款，共同向农村信贷项目进行投资。中国农业银行选择了自然条件优越、生产潜力大、开发资金不足的困难地区，作为农村信贷项目扶持的地区，并根据农业区域发展规划，选择内部收益高的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的项目，作为农村信贷项目投资的目标。截止1986年底，5个省（自治区）农业银行已向2012个分项目投资，发放农村信贷项目贷款44416万元。

(张放、张建国、邹一民、  
刘广新、林子洪)

## 中国银行一九八六年的外事活动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汇专业银行，中国银行在国际金融界有很高的声望，在中国与国际金融界的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随

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继续深入执行，中国银行在1986年的外事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开展。这些活动主要是：参加重要的国际性会

议,在国外发行债券,主持海外机构的开幕式,举行大项目的签字仪式,接待代理行的人员来访等。通过这些活动,宣传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介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和投资环境,了解了世界经济、金融动态,沟通了信息,增进了友谊,为促进中外经济贸易合作发挥了桥梁作用;并为我国的四化建设筹集了急需的资金;扩大了中国银行的影响,促进了中国银行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具体情况如下:

1986年6月,中国银行牵头与有关部委、公司负责人组成中国银行代表团,参加了加拿大皇家银行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两地举办的中国“七五”计划宣讲会,并出席了1986年世界博览会开幕式。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加拿大各地和美国的政府及工商、金融界人士,共470多人,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此次会议,对增进中国与加拿大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起了积极作用。9月30日至10月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年会,中国银行领导率团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之后并出席了日本输出银行在大阪举办的“促进日本与五洲各国经济交流研讨会”。中国银行代表团在美国受到年会组织者及国际金融界的重视,通过中国银行代表团的的活动,对扩大中国银行在年会上的影响,增进相互了解,加强业务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银行领导先后三次率团赴日本东京、联邦德国发行债券,均取得了圆满的成

功,以较好的条件为国家筹集了一批资金。此外,中国银行领导还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商业及贷款合同签字仪式,山西平朔煤矿贷款的签字仪式,参加签字的中、外双方负责人受到了赵紫阳总理的接见。

7月,中国银行领导率团赴古巴签订了中古贸易结算协议和贷款结算协议;赴美国“万事达”国际组织进行业务考察,为中国银行信用卡业务的发展作充分的准备。应苏联财政部邀请,中国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率团访问苏联商谈中苏公民私人汇款业务,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为主持中国银行悉尼分行、巴黎分行和东京分行的开幕典礼,中国银行有关领导率团于同年2月、3月和10月分别访问了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受到上述各国财政金融部门的重视和欢迎,在日本受到中曾根首相的接见。

1986年内,由外国代理行中、上层领导率团来中国银行访问的共计135批,约700人,其中21批分别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会见。此外,临时洽谈业务的外宾,全年约900批,计5000多人。

中国银行在进行上述一系列外事活动的同时,在1986年还与国外银行联合举办了一些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讨会,介绍有关欧洲货币单位、有关瑞士出口信贷、有关旅行支票和信用卡业务等情况,为中国银行与各国银行之间的相互学习、交流与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郑鸣雁)

## 中国银行与外国银行

### 一九八六年联合举办的研讨会简介

一、1986年2月25日至27日，法国巴黎巴银行讲座团在北京举行了有关欧洲货币单位（ECU）情况的讲座。讲座团由法国巴黎巴银行亚洲部总经理、香港分行执行副总经理菲利普·奥贝尔率领，主要成员有该行伦敦分行资本市场调查部经理冈恩、香港分行亚洲部总经理约瑟夫·于、总行经济、金融调研部副主任德韦尔和伦敦分行资金部经理布赖顿等8人。

讲座于1986年2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开始举行。由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具体组织。出席讲座会的有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民航、对外经济贸易部及所属进出口公司、中外合资公司、社会科学院和部分大专院校以及中国银行等40个单位的140多名代表。讲座共分六讲，内容由浅入深，如回购业务等讲解生动活泼，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

ECU本来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使用的记帐单位。但由于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需要，其用途日益扩大，目前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四种主要货币之一。在我国，ECU的用途和使用方法过去鲜为人知，通过这次讲座，一方面普及了ECU的基本知识，使我们获得了新的信息，同时对我们今后开展ECU业务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1986年4月7日至19日，与瑞士银行合作，先后在我国广州、深圳、福州、上海、北京、郑州举行了有关瑞士出口信贷情况的研讨会。研讨会由瑞士银行高级副总

裁罗伯特牵头主办。出席研讨会的有中国银行信贷一、二部及其它各部门的代表。研讨会上，具体介绍了瑞士银行的信贷体制，及其低利率信贷对中国的好处。通过此次研讨会，进一步促进了中瑞两国的金融合作及贸易发展。

三、1986年4月1日至4日，与美国美洲银行在昆明举行了有关旅行支票业务情况的研讨会。研讨会由美洲银行吕国威先生主持，中国银行共有50位代表参加。在研讨会上，美国美洲银行介绍了有关旅行支票业务的情况，进一步增进了中国银行与美洲银行之间的相互了解。

四、1986年7月15日至17日，与美国运通公司合作，在我国南京举行了信用卡和旅行支票业务研讨会。研讨会由美国运通公司蔡友盾先生主持。中国银行有8个分行和部分城市的公安局共30多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会上，美国运通公司介绍了信用卡和旅行支票的使用方法，以及防假等问题。

五、1986年8月21日至22日，与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合作，在我国上海举行了信用卡业务研讨会。研讨会由万事达卡亚太地区副总裁李圣斌先生主持。中国银行11个分行和上海市的特约单位共113名代表出席了研讨会。会上，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向中方代表们详细介绍了信用卡的业务情况。

六、1986年9月24日至30日，与美国花旗银行合作，在我国厦门举行了有关信用卡和旅行支票业务情况的研讨会。研讨会由美国花旗银行麦礼宾先生牵头组织。中国

银行 30 多个分行共 54 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会上，美国花旗银行介绍了信用卡和旅行支票的业务情况。

七、1986 年 10 月 14 日至 18 日，与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合作，在北京举行了旅行支票业务研讨会。研讨会由国际商业信贷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阿明先生主持。中国银行 50 个分行共 60 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会上，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介绍了旅行支票的

业务情况。

八、1986 年 12 月 17 日至 19 日，与 VISA 国际组织合作，在北京举行了信用卡和旅行支票业务研讨会。研讨会由 VISA 国际组织亚太地区首席总经理巴斯克里拉主持。出席研讨会的有中国银行 19 个分行共 44 位代表。研讨会上，VISA 国际组织介绍了有关信用卡和旅行支票的使用问题。

(徐 敏)

## 一九八六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外事活动

1986 年，随着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国际金融业务的发展，该行与国外金融界的友好交往日益增进，业务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强。全年接待国外银行代表团 9 次，组团 5 次，出访 6 个国家。

1986 年主要代表团来访情况。5 月 5 日到 5 月 13 日，以奥克塔维亚·切查利亚副行长为团长的罗马尼亚投资银行代表团一行 5 人来华访问。在京期间，双方就进一步扩大罗马尼亚投资银行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业务合作交换了意见。代表团还访问了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接见了罗马尼亚朋友。代表团在华期间，还访问了建设银行陕西、广东、深圳等省市分行。5 月 21 日至 5 月 31 日，匈牙利国家银行副行长索尔泰斯等一行 6 人来华访问。匈牙利国家银行代表团在京期间，双方就加强国际金融活动中的联系和合作交换了意见。同时，代表团拜访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部门和单位。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接见了匈牙利国家银行代表团。

1986 年主要代表团出访情况。10 月 9

日至 10 月 27 日，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周汉荣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代表团，访问了罗马尼亚、匈牙利。代表团就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等问题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国家银行进行了有益的探讨。11 月 15 日至 12 月 4 日，以行长周道炯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代表团，访问了加拿大和美国。代表团同加拿大皇家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银行等进行了多方面的业务会谈，特别是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办成真正的投资银行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9 月 4 日至 9 月 20 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考察团访问了日本，并与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就国际金融业务进行了研讨。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1986 年的外事活动，在考察国外金融体制和金融管理、同有关国家的长期投资银行建立业务合作和联系，以及调查国际金融市场情况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时也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开展筹集外资和外汇业务作了一些准备工作。

(孟光明、杨 华)

1986年5月，国务委员王丙乾。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周道炯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匈牙利国家银行副行长索尔泰斯一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供稿)



## 中国投资银行一九八六年外事活动情况

1986年中国投资银行的外事活动，主要包括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外国商业银行间的业务活动，以及投资银行派代表团出国访问、接待外国金融界来访等几个方面。现分述如下。

### 一、与世界银行间的业务活动

1986年内，主要与世界银行签订第三笔贷款协定，并谈判第四笔贷款。中国投资银行向世界银行借入的第三笔贷款，在1985年下半年已基本谈妥。1986年1月，由财政部与中国投资银行共同组成5人代表团赴华盛顿谈判，达成1亿美元的贷款协议，并于4月16日在华盛顿签约。3月份，世界银行工业开发金融处处长克拉索等来中国投资银行访问，并赴江苏、上海等地视察中国投资银行项目。4—5月份，世界银行预评团来中国投资银行就第四笔贷款问题进行预评估，并视察了有关分行和贷款项目。7月份，以康恩为首的世界银行评估团

来访，就第四笔贷款问题与中国投资银行会谈，基本上达成了协议。该团还赴广东、四川、湖北、江苏、上海等地访问和视察项目。10月份，世界银行项目局长范德米尔等来访，并赴天津、上海、浙江等地，视察了造纸、包装、塑料、丝绸等行业的情况。

### 二、与亚洲开发银行间的业务活动

1986年8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请示报告，同意由中国投资银行转贷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第一笔中小工业项目贷款后，中国投资银行开始与“亚行”联系，并相互提供资料。10月31日至11月3日，以国别局中国处处长小林英治为团长的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团应中国人民银行的邀请来访，中国投资银行接待了代表团，并就“亚行”给我们的第一笔贷款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谈。

### 三、与外国商业银行间的业务活动

在前两年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大量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 1986 年上半年开始与一些外国商业银行商谈借款问题。5 月 8 日, 第一笔向外国商业银行借入的贷款协议, 在北京签字。8 月 9 日, 另一笔向另一外国商业银行借入的贷款在北京签字。

#### 四、中国投资银行代表团出国访问

主要有 4 次: (一) 6 月 30 日至 7 月 4 日, 应印度工业信贷及投资公司的邀请, 由中国投资银行常务董事李锡奎、副行长卫锡根率领的代表团赴印度考察。(二) 9 月 10 日至 19 日, 应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的邀请, 由中国投资银行常务董事赵玉琢、副行长赵法事率领的高级代表团访问日本, 并与该行签订了业务合作协议。(三) 10 月 9 日至 27 日, 以中国投资银行副董事长周汉荣为团长的建设银行、中国投资银行代表团, 赴罗马尼亚投资银行和匈牙利国家银行访问考察。(四)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4 日, 应世界银行和加拿大皇家银行的邀请, 由中国投资银行董事长周道炯和行长吕成林率领的考察团, 赴

美国和加拿大访问考察。

#### 五、接待外国金融界来访

1986 年来中国投资银行访问的外国金融界人士多达 100 余人, 其中应邀来访的主要代表团有: (一) 5 月 5 日至 13 日罗马尼亚投资银行副行长奥克塔维亚·切查利亚等 5 人来访。(二) 5 月 21 日至 5 月 31 日, 匈牙利国家银行副行长索尔泰斯等 6 人来访。(三)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2 日, 法国国家信贷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让·热涅尔等 2 人来访。(四)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5 日, 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副行长武内昭彦等 6 人来访。(五) 12 月 23 日, 日本第一生命保险株式会社第一副社长、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董事龟田浩、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常务董事杉田敬一、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常务董事水野秋等应邀来北京参加中国投资银行成立五周年纪念招待会。

(中国投资银行办公室)



世界银行工业发展金融处贷款官员康恩、苏传绪等参观投资银行贷款项目

(中国投资银行供稿)

## 一九八六年重要的国际金融活动

### 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6年3月10日，正式成为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的成员。

我国在“亚行”的代表权问题，经过两年多的交涉和谈判，终于按照我国的原则立场得以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加入亚行，台湾当局保留其成员资格，改称“中国台北”（TAIPEI, CHINA）。这是继1985年5月我国参加非洲开发银行之后参加的又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也是继我国1980年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席位和与国际清算银行建立往来等之后，在区域性国际金融活动方面的突破和发展。

我国提出加入亚行始于1983年。1985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派出代表在马尼拉与“亚行”当局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亚洲开发银行谅解备忘录》，其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加入“亚行”；台湾可以改称“中国台北”继续留在“亚行”。此后，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代表我国向“亚行”正式提出了入行认股申请书。1986年2月17日，“亚行”理事会以压倒多数的投票通过接纳我国加入“亚行”的决议。在我国履行了各项入行手续后，“亚行”当局于3月10日正式宣布我国为“亚行”成员。

我国认缴“亚行”股本为114000股，约

值11.55亿美元，约占“亚行”股本总额的7%。我国在47个成员中认缴额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第三位。我国向“亚行”认缴的股本分4次缴付，迄今已缴纳了两笔股本，其中外汇部分共约3500多万美元，人民币部分共约1.58亿元。余额将在明后两年陆续交齐。

“亚行”成立于1966年，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有影响和有经济实力的政府间金融机构，对资助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一定作用。“亚行”的宗旨是向本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合作。“亚行”的主要业务活动是进行项目贷款、技术援助、股票投资、联合筹资。“亚行”自1966年12月正式营业以来，其融资能力和业务范围都有很大发展。到1986年底，“亚行”成员认缴的股本总额已达195亿美元。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享有良好信誉，以发行债券等形式筹集资金，1986年其未偿还的借款额为71亿美元。“亚行”批准的贷款总额为195亿美元，其中普通贷款为133亿美元。优惠贷款为62亿美元。目前亚行的普通贷款利率为可变利率，每半年调整一次，自1987年1月1日起，年利率为7.36%。贷款期限从10年至30年，含宽限期2至7年。“亚行”软贷款为无息长期优惠贷款，只收年率1%的手续费，期限最长可达40年。截至1986年底，“亚

行”共资助项目达 775 个。总起来看,这些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管理水平都是较好的,“亚行”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各种发展资金规模,仅次于世界银行。“亚行”无论对促进本地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还是开展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南北对话”或合作,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目前“亚行”有 47 个成员。其中亚太地区成员有 32 个,按照“亚行”章程的规定,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成员中的非亚太地区发达国家亦可参加“亚行”。目前参加“亚行”的这类国家有 15 个,它们是“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挪威、芬兰、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

1986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2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以“亚行”中国理事身份,率团首次出席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亚行”理事会第十九届年会。“亚行”年会,是“亚行”各成员国财政金融领导人 and 国际工商、金融界人士一年一度的盛会,出席第十九届年会的有各成员国和国际经济金融界人士 1200 多人,会议讨论了亚太地区经济问题,并制定了亚洲开发银行今后一年的业务计划。会议通过了为“亚行”软贷款窗口——亚洲开发基金第四次补充增资的方案,增资规模为 36 亿美元。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各国代表一致选举藤冈真佐夫再次担任“亚行”行长,任期 5 年。

然而,在马尼拉年会的整个进行中,人们所关注并议论的中心是中国代表团的首次出席。陈慕华国务委员及我国代表团一直受到与会各方面的广泛的热烈欢迎。国际金融界和舆论界对中国加入“亚行”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中国加入“亚行”,“完全实现了‘亚行’的亚洲性”,“亚行”在其发展史上,从此进入了新时期。“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使“中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本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进入持续增长和发展的新纪

元”。

5 月 1 日,陈慕华国务委员作为“亚行”的中国理事,在全体会上发言。她全面阐述了我国加入“亚行”的重要意义,她说:“有 10 亿人口的中国参加‘亚行’,提高了‘亚行’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亚太地区来说,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亚行’的业务涉及 25 亿人口的地区,关系着推动着 47 个成员之间的合作,包括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亚行’在亚太地区这一层次的合作所取得的成就,必将推动全球这一层次的合作,从而可以为振兴亚太经济,振兴世界经济作出贡献。”陈慕华在发言中郑重表示,我国将本着“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这四项原则的精神,参加“亚行”的活动,为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在发言中,陈慕华还提请各国理事和亚行当局注意,中国加入“亚行”后,考虑到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希望在“亚行”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能早日解决在“亚行”董事会为中国单独增设董事的问题。

在十九届年会期间,由于台湾当局拒不接受在“亚行”改称,中国台北的代表没有出席这次年会。对此,陈慕华在发言中表示:“我们愿意按照与‘亚行’当局达成的协议,同中国台北的代表在‘亚行’的范围内共事合作。”在 5 月 2 日上午年会闭会的前夕,陈慕华国务委员应新闻界的要求,举行了专门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她再次诚恳地表示:“我们一贯主张和台湾进行‘通商、通航、通邮’,我们今后当然也愿意在‘亚行’范围内与中国台北的代表进行业务合作。遗憾的是,中国台北的代表没有出席本届年会。”她表示希望在“亚行”于日本大阪举行的下届年会上,台湾代表能和“亚行”所有其他成员一起共商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

陈慕华和中国代表团在马尼拉期间,受到了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的接见,与各国

代表团和经济金融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以上各方面活动,不仅加深了我国与各国人民间的友谊,而且使各国经济金融界及舆论界对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有利于扩大我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

年会之后,为了促进我国与“亚行”的业务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应中国人民银行邀请,“亚行”行长藤冈真佐夫一行于1986年5月12日至17日访问了我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接见藤冈真佐夫时表示:中国 and “亚行”的合作前景是广阔的。中国愿意为实现“亚行”的宗旨,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作出自己的努力。7月中旬,亚行主管业务的副行长纳拉辛汉姆又率高级专家代表团来我国访问,进一步落实双边合作的项目和规划。到1986年底,双方已商定,“亚

行”于1987年向中国提供约2.5亿美元的贷款,并向中方提出七、八个项目提供无偿技术援助,金额近200万美元。

“亚行”第二十届年会,将于1987年4月27日至29日,在日本的大阪市召开。第二十一届“亚行”年会,将于1988年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召开。我国已与“亚行”达成协议,1989年“亚行”第二十二届年会将在我国首都北京召开。

我国已成为“亚行”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二大认股国,将是单独有“亚行”董事席位的唯一发展中国家成员。我国将充分地利用在“亚行”的独特地位和影响,积极开展与亚太地区及世界各国的经济和金融合作,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车培斌)

## 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情况

1986年11月10日至1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是我国与美国金融界首次举办的大型研讨会。它标志着中美金融关系的重大进展,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反映了美国及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抱有浓厚的兴趣。通过这次研讨会,美国金融界人士更进一步了解了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进程,增强了与我国发展经济、金融合作的信心与决心。

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范尔霖先生、前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先生、前商务部长埃里奥特·理查德森先生,以及20多位美国金融界著名人士,同

以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为首的我国有关部委和金融界的负责人一起,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会议盛况空前。会议期间,邓小平主任会见了约翰·范尔霖一行。这充分显示了中美双方对这次研讨会的高度重视,也表明双方都具有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和加强经济、金融合作的愿望。

这次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的副理事长、副行长刘鸿儒首先代表中方发言,做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与未来”的讲演。他详细地介绍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面临的问题;“七五”时期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即:(1)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2)理顺利率体系;(3)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体系;(4)有步骤地开放金融市场;(5)

加强和改善外汇管理。他的讲演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高度评价。

经验丰富的美国金融界决策者们,就以下6方面的问题做了精辟的发言:

第一,介绍证券市场发展概况。论述资本市场的职能、范围和演变过程。说明了证券市场如何推动经济发展;比较了储蓄和投资在证券市场和银行系统中的流通情况;论述了在没有证券或证券市场不发达的一些国家里,储蓄及投资过程的不同之处;解释了证券市场如何决定价格与利率,以及政府或政府机构在证券市场中应起的作用。发言还讲述了公众如何从健康运行的证券市场中受益,讨论了分散金融投资决策权的益处,以及如何识别和控制由此而引起的风险。

第二,介绍了美国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作用及其演变。这些机构包括开展多种业务的商业银行、专业贷款机构、小储蓄银行、经纪人及代理人、投资机构与保险机构等,分析各种金融机构的职能作用及利弊,并讨论了美国与其他国家金融体系的差异。着重讨论了金融机构突破时空限制、业务全球化趋势对一般性筹资过程的重要性,及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意义。

第三,介绍了金融市场上所采用的各种金融手段及方式,以及它们如何满足各种借贷的需要。重点讨论了股票与债券等不同金融手段的特点,概述了因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而产生的各种综合性投资手段。评述了因政府管制放松后产生的新工具。分析采用新投资手段可能引起的问题和风险,还说明针对金融改革所制定的规章制度。

在这一部分还特别讨论了适合于中国的金融手段及方式,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和有益之处,提出当前采用某些金融方式所存在的障碍,以及逐步消除障碍、减少风险的建议。

第四,介绍纽约证券交易所近200年的历史及贡献。回顾了交易所存在20、30年代中出现的问題,当时采取的管制与立法措

施。概述了交易所的新发展。探讨了交易所与筹措资金及资产管理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比较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与世界其他主要交易所的特点,介绍了世界各主要交易所及一般金融机构所采用的技术的发展过程,包括电脑系统经营、结算、市场信息、数据统计及监督管理上的开发运用。最后探讨了有关中国金融市场的技术现代化问题。

第五,介绍了美国资本市场的法律及管理体制,以及该体制如何适应经济环境而不断变化。重点讨论了各种权力机构,例如,证券交易所委员会以及全国证券交易所对美国证券交易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保证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公正性与可靠性的信心。根据美国证券法,证券交易的情况必须公开,要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发言中还概述了英国和日本证券市场管制制度的最新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第六,论述了向投资者提供信息和教育的必要性。证券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投资者需要清楚地了解证券市场的工作程序,熟悉必要的金融与法律知识,并随时掌握他们投资后的信息,这样才能对投资进行选择。发言还介绍了股票挂牌上市的公司和美国证券业如何帮助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选择证券。

这次研讨会,对加强和促进中美金融界的合作,借鉴美国的经验,开拓中国的股票、证券市场,促进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还达成了关于教育与交流的协议。双方同意,鼓励和促进两个机构及它们的成员或附属金融机构之间,进行教师、讲学者和有资历的金融专业人员的交流。互派研究生、研究学者和有资历的金融专业人员,到对方国家进行学习和实习。

(张惠华)

## 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情况

1986年11月11日至16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几位专家和执行董事出席了会议,他们是:基金副总裁埃伯,对外关系部主任默罕默德、中央银行部副主任康妮、财政事务部主任坦齐、研究部副主任克洛克特、亚洲部高级顾问斯哥特、利比亚执行董事费南齐、伊朗执行董事萨利科、日本执行董事福田、意大利执行董事采切尼、印度执行董事辛古普塔。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出席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中方参加会议的还有,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安志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甘子玉、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中国人民银行特邀顾问尚明,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和部分省市代表共150余人。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并借鉴外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情况和经验,为我国宏观经济体制管理和经济改革服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在重大的经济变革时期,应选择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围绕这一问题,中外双方专家们进行了专题发言和友好、坦率的讨论。基金组织的专家们,高度评价了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他们较详细地介绍了现代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经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发表了不少见解,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中方经济界和金融界的专家与代表,也就我国近几年在计划、金融和财政体制方面的改革经验,作了总结和介绍。通过互助交流和共同

探讨,与会代表对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和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等许多重大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代表们认为,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从长期看,发展中国家可以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但应避免片面追求短期的经济高速增长,这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引起突发性的经济调整,使社会、经济生活承受较大的痛苦。因此,只有在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持久的经济增长。

为了在稳定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就需要有一套可行的政策,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达到平衡,并使两者协调增长。在这方面,需求管理是重点。需求管理,就是要使需求与潜在供给保持同步增长,这要借助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外债管理政策等等。

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调节,是通过中介指标来实现的。代表们认为,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不应该再用现金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也不能完全套用外国的广义货币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而应根据中国的情况,把广义货币和国内信贷总规模这两个总量指标都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而应根据中国的情况,把广义货币和国内信贷总规模这两个总量指标都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同时,还要改进现行的信贷限额、中国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贷款、存款准备金、利率等货币政策的工具。此外,专家们强调,货币政策一定要由中央银行总行制定,各地区不能分权。目前允许中央银行省、市分行有权发

放临时贷款，主要是为了解决资金分配不均衡，调拨不灵的问题，这种做法十分危险。要从根本上解决资金分配与流通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资金市场。

财政政策对社会总供求的调节，一般借助于预算政策和税收杠杆。代表们认为，财政的主要职能在于促进经济增长，但为了给经济稳定增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政府应采取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经验表明，赤字财政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是弊大于利的。当追求经济增长与其他经济目标相矛盾时，决策者应当对追求增长给其他经济目标带来的影响程度有充分的认识，并能采取相应弥补措施。

代表们认为，适度的举借外债，可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从而能促进经济发展，但大量事实表明，建立在外债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从货币角度看，外债的增长与国内通货膨胀的结果是 -

样的，必然会引起货币扩张，从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外债使用上，最关键的是要将外债用于生产性投资上，并注意同国内资金的配合。针对中国目前的情况，代表们建议，中国应根据经济总体对外债的需求及其对外债的承受力，来确定一个举借外债的数量界限，并保证在实际执行中不超过这一界限和调整目前不合理的外债结构。此外，应设立一个有权威的外债管理机构来统管和监督，加强外债信息的收集工作。

此外，代表们还讨论了中国的外贸政策、汇率政策、价格改革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建议。

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它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了解国外的经验。这对我们加强和改善经济管理是十分有益的。

(韩振才)

## 第五届第三世界保险大会

第三世界保险大会，是在加强区域性保险合作，有助于本地区国家改善保险服务，发展本国保险市场，减少保险业费用支出的指导思想下成立的。第一届大会，于1977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主要议题是：通过保险合作，促进区域保险业务发展。第二届大会，于1980年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议题是：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第三届大会，于1982年在肯尼亚的肯雅塔召开，议题是：在80年代通过保险合作促进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第四届大会，于1984年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召开，中心议题是：保险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986年6月23日至27日，第三世界保险大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五届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国家保险公司的310名代表和观察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程万铸为这次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副主席、本届大会的主席。

会议期间，田纪云副总理到会讲话，他代表中国政府祝贺第五届第三世界保险大会的胜利召开，并在讲话中分析了国际形势，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介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情况。国务委员陈慕华接见了部分与会代表，并设宴招待全体与会代表。